

新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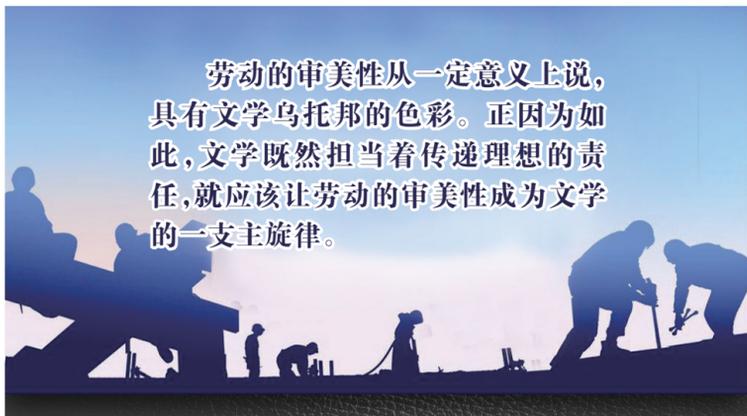
劳动的审美性

□贺绍俊

陶渊明被人们视为追求闲适生活的代表性诗人。但人们不知注意到没有,他的闲适是与劳动联系在一起的。他在诗中这样写到劳动:“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他从晨兴起一直劳动到带月的晚上,应该很劳累吧,但诗中流露的却是惬意!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活动和生存活动,劳动自然也会成为文学重要的表现对象之一。马克思说过,劳动是使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性活动,劳动满足了人的需要,是人的生命活动。陶渊明的诗句真是以诗的意象诠释了马克思的理论。

文学中的劳动描写并非都是陶渊明式的闲适,因为现实中的劳动是要流汗的。人类通过劳动创造财富,也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因此,在作家的笔下,劳动者形象常常是正面、积极的甚至是伟大的。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劳动往往与困难、勇敢、拼搏、收获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在启蒙精神照耀下的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劳工神圣的口号,劳动和劳动者形象获得了特别的礼遇。但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劳动者形象以及劳动的书写还是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劳动者以建设新中国的姿态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如柳青《创业史》中的梁生宝、草明《乘风破浪》中的李少祥。然而不断升级的阶级斗争风雨,使得劳动者难有用武之地。改革开放时代宣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劳动创造世界的意义得到重申,劳动者形象才真正走上文学舞台的中心。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妨看作是一部重树劳动权威的作品,路遥所书写的世界正是一个由劳动者创造的新世界。在小说的最后,孙少平怀揣着理想回到大牙湾煤矿,这意味着主人公回到劳动的洪流之中。路遥说,“这是赞美青春和生命的歌。”

在这篇短文中,我要特别强调一点,即劳动的审美性。作家们对劳动的书写越来越接近劳动的本质——它是人的生命活动,因而劳动成为一种美好、健康的审美意象。刘庆邦的短篇小说《月光下的芝麻地》就是一首劳动的抒情诗。小说的故事很简单,写的是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一群年轻妇女表现特别积极,争做无名英雄,在队里准备收割芝麻之前,抢先悄悄地把芝麻都收了。过去的小说中不乏这样的故事,套路基本一样,主题也基本一样,无非是要表现人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无私奉献的精神。但刘庆邦却能在这样一个老掉牙的故事上翻出新曲,并唱出新颖别



致的韵味来,就因为他能将劳动作为一种审美对象,在他以往的生活记忆里,翻检出劳动所带来的幸福感,进而带着这种幸福感来讲述故事。这种劳动又是与大自然连在一起的,大自然的审美与劳动的幸福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篇小说的和谐乐章。玉青等四个大姑娘在集体劳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睛还没到参加集体劳动的年纪,却非常羡慕大姐姐们的友谊,很想加入她们的队伍。睛猜到玉青四个人密谋早起杀芝麻,因为“她们几个都是爱干活儿的人,都是喜欢结伴干活儿的人,都是以结伴干活儿为快乐的人,得到杀芝麻的机会,她们大概不会放过”。于是,她在夜里钻进芝麻地,果然等到了玉青她们的到来,这些大姐姐们也高兴地接纳了这位同样热爱劳动的小妹妹。待村里的上工铃声响起,人们惊奇地发现,地里的芝麻全部放倒了,五个姑娘正在地头的水塘边洗脸。秋水有些凉,但姑娘们的感觉是:“痛快!真痛快!!痛快死了!!!”三个“痛快”,六个惊叹号,真是把劳动的欢乐写得透透的。刘庆邦以平白的语言,把一个简单、漂亮、饱满、充盈的劳动过程充分展现出来,平白的语言中浸满了劳动之美。

劳动的审美性也为作家突破思想的樊篱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王蒙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写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但搁置了数十年之久拿出来仍然显示出文学的风采,并获得了茅盾文学奖,这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王蒙在写这部小说时注重劳动的审美性,从而使他能够超越时代的种种禁忌与约束,

通过审美的渠道与当时的劳动者获得心灵上的沟通。我读《这边风景》,首先感觉最强烈的是作者对劳动的赞美。劳动的主题是这个小说的潜在主题。劳动与心灵在对话,劳动与自然相融洽,传递出那个时代一位未曾泯灭理想的作家对未来的想象,以及对人性的理解和对生命的理解。于是,由劳动引发的这些精神想象便具有一种永恒的文学价值。小说中有大量关于劳动的叙事,劳动与健康连在一起,与健美的身躯连在一起,小说所赞美的劳动基本上是与大自然相融洽的体力劳动,但凡作者写到大自然环境中劳动的场景,那些关于阶级斗争的各种矛盾和烦恼便云消雾散了,作者眼中所看到的只是劳动与自然的关系、劳动与身体的关系,于是他放纵笔墨,酣畅淋漓地书写劳动的愉悦和精神的爽快。回过头来阅读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小说,就会发现,通过劳动叙事来表达作家内心的美好和理想,也是当时一些作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作家们将劳动的审美性从劳动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中剥离开来,因此他们特别愿意写劳动,一写到劳动仿佛就换了一副面孔,精神变得自由自在。

马克思既肯定了劳动的价值,同时又尖锐地指出在人类发展历史中劳动始终处于异化的状态,例如在资本主义的恶劣时期,劳动者宁愿毁坏劳动的工具。劳动的审美性从一定意义上说,具有文学乌托邦的色彩。正因为如此,文学既然担当着传递理想的责任,就应该让劳动的审美性成为文学的一支主旋律。

■关注

我一直难忘第一次见到他的情形。那是间极为普通的男工宿舍,但六个人中的他却让我眼前一亮——他的脸大过标致。我更惊诧于他的眼神,从高处射下,睥睨、不屑,甚至刻薄。这眼神流露出比讽刺更多的悲伤(一种敏感至极的悲伤)。仅仅那么一闪,就充分展现了一个饱受孤独之苦的人的全部悲恸。那时,我只是朦胧地感觉到他一定“有料”,但没想到,他的故事那样丰沛激烈。

在纪实文学《工厂女孩》和《工厂男孩》中,我一直试图描述珠江三角洲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并将思考放在乡村与城市的疏离、撕裂和断层上,在遇到这个男工的刹那,我陡然起了这样一个念头——也许我可以集中精力描述一个人。于是,经过三年多的奋战,长篇小说《工厂爱情》得以诞生。

我为长篇小说《工厂爱情》的主人公定名为“向南方”。我想我这一生都很难忘记那些场景,他讲述,我记录。我那样小心翼翼,生怕掏本子、拿钢笔的动作会吓到他。在东莞樟木头镇的工厂路上,我深度地参与到“向南方”的生活中,面对面聊天、时不时打电话、在QQ空间留言。那段时间,我们互相承担着“最好的倾诉者”与“最佳的聆听者”的角色。

最初的“向南方”是拘谨的,等我们日渐熟悉后,他整个人便亮堂了起来,那挂在嘴角的微笑也从冰凉变得和煦。他真是让我惊诧至极!这样一个普通的男工,其经历却拥有通俗剧所具备的一切元素:叛逆、反抗、逃离、流浪、猜忌、情杀……一波接一波,冲突不断。那死结不断地打下去,越打越紧,越打越多,而结局却那样突兀干脆。他总是活泛而不安分,试图创业,折腾出一条新路,急于站在人尖上,然而,却总是以失败告终。当他在讲述个人经历时,有着一一种独特的调门,非常平静而理性,好像是在说某个电视剧的情节。但有时,他也会“理直词穷”。静默片刻后,又急中生智,突然地蹦出一个词来。

在从传统到现代、乡村到城市的转型中,乡村青年进城的命运也许是一个时代的隐喻。“向南方”是中国版的嘉莉妹妹吗?或者是于连?或是盖茨比?更年轻的高加林?他的存在对樟木头镇、东莞市、广东省、中国乃至世界,意义何在?描述这种貌似从正常生活轨道中偏离出去的生活,价值何在?在《工厂爱情》中,我试图以“改革开放”40年岭南突变的历史图景为依托,追溯“90后”工厂男孩的情感史,以分析其恋爱轨迹和求职经历为线索,力图展现改革大潮中个体命运的起伏跌宕,张扬被“历史大说”所遮蔽的日常生活及幽微细节,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境况,窥视当代中国在南方发生的巨变。

事实上,“90后”工厂男孩的情感史就是一部身体解放史。他们的父辈从农村来到城市打工,身体变得可以移动起来;但是到了他这一代,身体获

人人都是「向南方」

□丁燕

得了更大的自由度。曾设在东莞樟木头镇的收容所,是所有农民工心头的噩梦——如果没有暂住证,会被拉到这里来。然而,等“向南方”出门打工时,收容制度已被取消,故而他的选择变得宽松许多。然而,自由移动便意味着身体的全面解放吗?“向南方”所经历的遭遇,比之父辈,反而更复杂诡异。

“90后”工厂男孩的情感史同时还是一部伤害史。作为留守儿童的“向南方”曾是受害者,但后来,他也伤害着别人。在这个“伤害链条”中,无一人能够幸免。三岁时,他被母亲的皮鞋尖踢倒在地后,像被摘除掉“正常芯片”,进入到一场因果报应的狗血剧中,备受折磨。他因匮乏之爱而渴望爱,因害怕爱而不会爱,因不懂得表达爱而让爱泛滥。虽然大多数时候,他是个热情、善良、重义气的男工,但他却无法建立起一个正常的恋爱心态,无法找到一个平衡点,形成一种相对稳固的价值观,致使他一直都处于晃悠悠的飘荡状态。

“90后”工厂男孩的情感史还是一部成长史。在“向南方”的成长历程中,包含着卑微、损毁和反抗。当我试图剥洋葱那样,剥开层层屏障,试图看到他内心深处到底藏了什么秘密时,我找到了“留守儿童”这个根结所在。他在成长期匮乏之爱,因知识积累薄弱,没有什么突出的技术,再加上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眼光去构想,故而大多数农村青年很难找到高工资和高技能的工作,只能从一个厂换到另一个厂,可选择性非常狭窄。有时,他们也会为自己设定一些梦想,但因蓝图过于宏伟,根本难以实现,就像脑袋在云层中,而双脚还在烂泥里那般。

当农业中国转型至工业化时,整个珠江三角洲一带发生的变化,就像江河汇入大海时产生的震动与摩擦,异常剧烈而惊悚。像“向南方”这样的一代人,被两个时代、两种生活紧紧地拉扯着、撕裂着。他们像从入海口回溯至东江的水浮莲,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在没有安全感的茫然中,凭本能挣扎。虽然“向南方”总是濒临深渊,走入绝境,但最终,他却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事实上,“向南方”的成长与出路,已和中国最广大的青年,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故而,不应以简化的方式来考察“向南方”的命运。从另一个意义上讲,“向南方”也是强者。

目前,中国农村父子两代都是农民工的家庭已很普遍。这个怪圈为什么能维持几十年并且益扩大?初中毕业的农村青年现在找工作不成问题,但等大厂陆续搬走,等工厂的岗位更多地使用机器人后,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当今社会,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每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都有着休戚与共的联系,所以,人人都是“向南方”,人人都应该关注“向南方”。

是正巧遇上其中一位来探望老人,我的提问与探究,是不敢去触及这个“敏感”区域的。这些年来,为数不多关于他的所有媒体报道中,全都回避了他的情感经历和家人。

“没结婚,我也可以收养嘛。不过,也不算收养,就是帮帮他们……没啥好透露的。”言及此,老人眼里闪烁出一种尤为深情的光,主动说起了另外一个,而非当天前来探望的孩子:“34岁,在边防部队服役,当年考大学时差7分,本来是可以享受孤儿加分政策的。”“每年一两次吧,他偶尔回来看看我,我就特别开心。这些孩子们呀,都不喜欢文科,在文学上都没天赋,这也有点遗憾吧。”

为了获取一个相对仰视的拍摄角度,我抱着相机,坐在老人沙发面前的地板上。那只大花猫从我身边跃过,趴在主人大腿上。本文开头白描的那幅温暖温馨的画面,瞬即于我眼前定格。另外还有一只小黄狗,则并不黏人,自己在旁边晒着太阳。

差不多同时期的那些诗人、那些老友,多数皆已远去。周良沛依然在着,依然孑然孑立。他的生活里,他的身边,这些年日夜相伴、不离不弃的,惟有小闹与小黄。

小闹代表自己,也代表自己原来的主人。韦丘,诗人,广东省作协原副主席。2012年那个最后的日子,周良沛步履蹒跚,去广东送别这位长自己十岁的知交好友。事了,家人欲将与韦丘相伴多年的猫咪小闹送人。他极为伤感,便将其带回了昆明家中。

岁月流逝,这样一位“历史老人”,曾经的锋芒愈加内敛,惯看秋月春风、世间种种。但是,却也反而更加执念于自己一直所看重的事情。他想起老友邵燕祥。老邵俩各自还有本评论集,在一家大出版社出版,他的那本还好,老友的这本实在犀利,被要求删掉许多内容。“我们都希望别人对我们更加宽容和包容,我们也更加宽容和包容别人吧。”他若有所思。然而,对于诗歌,周良沛似乎依然有些斤斤计较,依然难以宽容与包容。

自己晚年时光全力以赴献礼新诗百年的《中国百年新诗选》,竟然编好并发布消息两年多都还没能上市,于周良沛而言是始料未及的。这或许就是他目前最大的一份执念。以至于当策划人表示终于可以考虑投入印刷时,他又第无数次地翻出书稿来,告诉自己必须再校对最后一次。“我的生命和时间可能都没多少了,必须抓紧。我很充实,每天都忙到12点多呢。”

说这话的时候,窗外溜进来的阳光,在周老的脸庞上跳跃着,光影倏忽,神情睿智。他的语速舒缓、沉稳,似乎无喜,更无悲。

(作者系昆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新作快评 鬼金中篇小说《失路之人》,《安徽文学》2019年第1期

绝望以及反抗绝望

□李小平 王春林

这些年来,在东北的文学版图上,鬼金的名字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闪亮。绝望与反抗绝望,本来是鲁迅先生有关的文学命题。鬼金的写作在很大程度上逼近着这样的文学命题,在中篇小说《失路之人》中,他异常简洁有力地把握绝望与反抗绝望的命题形象生动地表达了出来。

小说《失路之人》中,出现了一些讨论文学理念的文字。其一,是《怀疑:普利策奖戏剧集》中的一些文字:“弗林:是的。人们编故事来阐明理念,这是寓言的传统。”詹姆斯: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比虚构的故事更有阐明理念的价值吗?弗林:不,生活中真实的发生是无法阐释的。真实无法成为感人的布道。它既令人困惑,又无清晰的结论。”文学创作既与理念有关,更与生活真实紧密相关。如何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处理好理念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任何一位作家都无法回避的重要命题。这些话语的被引用,说明鬼金对相关命题有着敏锐的关注与思考。其二,在写作者赵挺弋与女友余薇的对话过程中,有这样一段表述:“他不是一个会讲故事的人。他的故事从来不是完整的,他只写人,写人物的性格和气质,给人下一场定义。”这几句话,毫无疑问是在以一种夫子自道的方式说明着鬼金自己的写作理念与写作方式。其三,还是在赵挺弋与余薇的对话中,曾经先后提及《七杀简史》《2666》《自由》《到大地尽头》《地下世界》等一些有影响的文学作品,“赵挺弋说,还没看,只是翻了翻,这样的小说在中国根本不能出版。余薇说,出版不重要,关键是你写出来。”“赵挺弋嗯了一声说,我根本没有那么辽阔的内心和视野。余薇说,我相信你。那一刻赵挺弋突然有些感动。”可以看出,鬼金其实是在委婉表达自己的高远写作理想。

《失路之人》的情节和人物都比较简单。身兼观察视角功能的,是自由写作者赵挺弋。赵挺弋之所以千里迢迢从武汉乘飞机返回到遥远的东北望城,是为了和妻子左晓丽解决久拖未决的离婚问题。没想到,等他飞抵沈阳

机场时天起了大雪。几次意欲搭车未果的情况下,赵挺弋只好联系当年的好友、出租车司机二勇前来机场,把自己接回望城去。赵挺弋和二勇的路途,也就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既然是故友重逢,也就免不了对各自生存境况的交流以及对于往事的回顾。这是小说最核心的内容,具体来说,我们所谓的绝望,乃集中通过赵挺弋、二勇以及他们曾经的师傅老古这三个人物形象地体现出来。

赵挺弋、二勇、老古都曾是一家轧钢厂工人。对于老古当年的自杀缘由,作家自始至终没有做出过明确的交代,而只是披露了老古自杀前留下的简短遗书:“把我轧钢厂的公墓卖了,随便换一个地方,我受够了。另,给我立一块碑。”如果将老古的遗书与他当年曾经力劝徒弟赵挺弋一定要想方设法离开轧钢厂联系起来,我们即不难断定,轧钢厂生存环境的令人绝望。另外,通过赵挺弋和二勇对往事的回顾,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老古的婚恋状况同样极不理想。若非如此,老古断不会采取自杀这种一种极端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

其次,是二勇的不幸遭遇。二勇和林南燕本来是一对美满的夫妻,没想到惟一的女儿小南却在一次歹徒袭击幼儿园的凶杀案件中不幸殒命。那个残忍的疯子“歹徒”,是从轧钢厂小集体分流出去的一位工人。林南燕的精神因此而受到强烈刺激,万般无奈的二勇只好把林南燕送进了精神病院。妻子疯了,老妈也已经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连眼睛都看不见了,二勇想离开望城去外面闯荡是不可能了。他只好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和技校的女同学尹秀搭伙过日子。尹秀当年之所以被技校开除,乃是因为遭受体育老师性侵犯的结果。被开除后的尹秀,只好以陪舞的方式谋生。这样一位女性,离婚后还带着孩子,其生存之艰难可想而知。两人的关系用二勇的话来说,就叫做:“搭伙,相互取暖吧!”

最后,就是在外面过着漂泊无定生活的自由写作者赵挺弋。赵挺弋原本也是轧钢厂的工人,酷爱文学写作。在轧钢厂工作时,赵

挺弋是吊车司机。一方面,是受到师傅老古的影响,另一方面,更是出于自身真切的体验,赵挺弋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囚徒处境的存在:“囚徒,是的,轧钢厂的囚徒。他这样命名自己,悬于半空的囚徒。他的敏感对于他来说,是痛苦的根源。他关注着肉身,同时寻找着精神困境的突围。”赵挺弋之所以毅然辞职,是因为轧钢厂的效益每况愈下,还因他的业余写作,不仅不为在银行工作的妻子左晓丽理解,反而还总是被嘲笑。尊严受损的赵挺弋决定离开这里,“那时候,他在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地下室里,那就是一个狗窝样的地方,每天50块钱。赵挺弋靠偶尔给人当枪手写剧本什么的活着。”如果不是有幸偶遇文学评论家余薇,我们实在无法想象,赵挺弋的生活还会因其艰难而沉沦堕落到何种程度。

老古因为无路可走而自杀,苟活于人世间的赵挺弋和二勇,也很难看到未来的人生出路。正是如此,赵挺弋才会产生一种特别“空茫”的“无力感”:“这几年来,即使书也没把他从无力感中拯救出来。”“他闭上眼睛在无力感之中,整个人在无力感中摊开,飘散在虚无之中。这种虚无时常侵袭他,让他也成为虚无的一部分。”某种意义上,赵挺弋之所以执意要去上山祭奠师傅老古,其实也是凭借自己以及自己所归属的这个群体。面对如此境况,到底该怎么办?人生的未来出路究竟何在?这无疑是在赵挺弋,也是我们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小说最后,鬼金写出这样的文字:“冰面不是路,下面的河水也不是路……上帝分开水,呈现的是不是就是一条路呢?他和这个世界的路在什么地方?世上本没有路,真的,走的人多了就有路吗?那路是他的路吗?”某种意义上,我们的确应该承认,鬼金的追问,把鲁迅当年的绝望与反抗绝望的命题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但问题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切实的解决。

问题会有最终解决的一天吗?鲁迅不知道,鬼金不知道,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只能和鬼金一起共同思考下去。

(上接第1版)

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如果做一个大致划分,我认为:青年时期的周良沛主要是诗人,中年时他偏重诗歌理论研究和批评写作,而步入晚年,他则更多是“隐身”在诗坛的背面,致力于为中国新诗做一些系统的梳理,编辑出版了诸多现代大诗人的作品,如《中国新诗库》中的《俞平伯卷》《戴望舒卷》《臧克家卷》《冯至卷》等十余卷,不可谓不厚重。

而最近这五六年,他越来越有限的精力,几乎都扑在了这套堪称集大成、总结性的《中国百年新诗选》上。其实,向中国新诗致敬的各种选本不在少数。但在周良沛看来,这些选本的个人偏好和个人审美都颇为明显,无法用来准确记录和反映中国新诗的发展历程。“所以,我不是选所谓的精品,我是作为新诗百年过程的记录来选编。这些作品,要能看出新诗百年的每个发展阶段。这就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周良沛说。

放眼当下中国诗坛,耄耋之年仍放不下诗歌的,周良沛便是其中之一。70多年的诗龄,也让他亲历、见证了百年新诗大部分的激情或惨淡岁月。“俞平伯、冯至、艾青、田间,等等,从小我都很熟悉,他们都给过我或多或少的影响。当下的有些诗人跟我私交也不错。因此,这个百年选由我来选,是合适的。”

至于选编的标准,自然要回到每个作品当时的历史语境里去考量。周良沛依然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当他读到闻捷情诗时的兴奋。因为那个时代是不敢谈论爱情的,文学里也不敢表达,所以闻捷的情诗恰恰符合了那个时代的需求。“如今看来,诗中也有许多缺点。”但这样的作品,周良沛也毫不犹豫地选入了《中国百年新诗选》,因为“这就是历史”。

各个历史阶段主要的代表作品,大多数皆在周良沛胸中。但要遴选出在网络传播方式迅捷的当下的作品,于他却是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不会上网,写稿校稿都是用汉王笔输入,因此也就更不可能去网络上大量检索和查找。“这一部分,我只能从别人的选本中再选。至于具体参考了哪些选本,我都记不太清了。”

坚守内心的宽容与包容

对于一位86岁高龄的老人,记忆有所衰退很正常不过。当我小心翼翼、却多次追问他究竟收养了几个孩子时,周老的回答显出难掩的沧桑与疲惫,“这个,我也没法说清楚,实在说不清楚。”当然,更可能地,是因为他不愿谈及自己的生活,“那跟诗歌无关”。

是的,他的“孙子们”全都与诗无关。如果不